

从君主制民族主义 到伊斯兰社会主义

——利比亚式现代化的流变与特征*

谢宇科 韩志斌

内容提要 民族主义贯穿利比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利比亚式现代化历经从奥斯曼帝国推动的早期现代化成果为意大利殖民者所摧毁，到形成宗教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并推动利比亚民族国家建构，从君主制两条道路之争确立过渡型现代化模式到革命民族主义系统性构建利比亚式现代化，再到从革命民族主义向超越民族主义转型，直至中东剧变卡扎菲政权垮台。民族主义、地租型经济形态和威权主义三位一体构成利比亚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模式。利比亚式现代化是政治发展先行却又滞后于经济、社会变迁，由民族主义驱动的现代化。

关键词 利比亚式现代化 君主制民族主义 革命民族主义
伊斯兰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 谢宇科，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西安 710127）；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西安 710127）。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并行发展的两大思潮，二者对人类历史和国际体系的巨大塑造作用是其他任何历史力量所不能比拟的。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主导了利比亚现代化甚至现代化研究的学术话语权，使用“无国家社会”^①“流氓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3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23VLS023）的阶段性成果。

① 无国家社会（Statelessness）最早被人类学家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用来概念化祖瓦亚地区部落拒绝政府，以及在卡扎菲革命后与国家若即若离的现象。这一概念被其他学者广泛借用，后演化成利比亚部落拒绝国家的概念，它将部落与现代国家对立起来，暗含卡扎菲的政治创建是“乌托邦幻想”，未能给利比亚社会带来“文明”的刻板印象。Matteo Capasso, “The Libyan Drawers: ‘Stateless Society,’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Logic of Exception’ and ‘Traversing the Phantasy,’”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23, No. 4, 2014, pp. 387 – 392; John Davis, *Libyan Politics: Tribe and Revolution: An Account of the Zuwaya and Their Government*, I. B. Tauris & Co. Ltd., 1987.

国家”^①等概念将利比亚现代化消解为互不关联的部分，这背后是西方现代化标准和意识形态作祟。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利比亚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及其特征和本质，从中凝练出“利比亚式现代化”的学理阐释。^②利比亚式现代化是利比亚民族主义的历史征程，承载了一系列曲折而冒险的民族主义激情。利比亚现代化进程跌宕起伏，根植于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历史土壤，兴盛于民族主义的推动，又因超越民族主义的尝试受挫而衰落。本文试图突破现代化研究的西方中心论，既是现实需要，更具学理探索性。^③

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民族主义、大国博弈与利比亚国家建构

民族国家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化的开端。正如钱乘旦所说：“民族国家的出现是现代化的起点，民族国家也就是现代化的载体。”^④历史上，多种文明在利比亚这个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相互竞逐，发轫于欧洲的现代化潮流在利比亚形成早期涟漪。然而，利比亚早期现代化^⑤命运多舛，经历了一段坎坷之旅，从奥斯曼帝国治下现代化开端，到意大利殖民统治中断现代化进程，再至民族国家建立后迈入现代化新阶段，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抗争是利比亚早期现代化的主线。

第一，在西方殖民威胁下，奥斯曼帝国启动了利比亚早期现代化。16世纪奥斯曼帝国占领利比亚，但长期实行间接管辖。19世纪奥斯曼帝国面临西方殖民威胁，决心直接控制利比亚，以此作为对抗西方的前沿要塞。1835年，奥斯曼帝国推翻卡拉曼利王朝并建立的黎波里摄政区，控制了整个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沿海地区，但对昔兰尼加和费赞的广大内陆地区鞭长莫及。19世纪中叶，奥斯

① 流氓国家（Rogue State）是指美国构建出来的那些实行威权统治、拥有一定军事实力、威胁美国地区利益的反美国家。美国将伊朗、朝鲜、古巴、利比亚等国列为“流氓国家”。Paul D. Hoyt, “The ‘Rogue State’ Ima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Global Society*, Vol. 14, No. 2, 2000, pp. 297–310.

② 本文主要是指伊德里斯王朝和卡扎菲执政时期的利比亚。

③ 国外相关研究参见 Lisa Anderson,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 1830–198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From Colony to Independence*,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8; John Wright, *Libya, A Modern History*, Routledge, 2022; Dirk Vandewalle (eds.), *Libya Since 1969: Qadhafi's Revolution Revisited*,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08. 国内相关研究参见韩志斌：《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利比亚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利比亚式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学术成果。

④ 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⑤ 指利比亚与西方文明交往过程中直接或间接的现代化改革实践，也是从被动接受到国家独立，有能力自主决定现代化路径的历史过程。

曼帝国在的黎波里摄政区推行早期现代化改革，其主要内容有四方面。

首先，推行土地改革，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从而增加摄政区财政收入。1858 年，奥斯曼帝国颁布农业法，推动帝国农业现代化改革。^① 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奥斯曼帝国推行土地私有化改革，吸引游牧民定居。同时，兴建少数水利设施，初步建立起灌溉、防风防沙体系。农业改革又推动的黎波里塔尼亚实行货币化变革，^② 农业税收实现长足增长。1900 年的黎波里塔尼亚农业什一税税收总额达到 69000 里亚尔，占摄政区年财政收入的 65%。^③ 其次，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对摄政区的控制。19 世纪 60 年代，奥斯曼帝国开始推行政治改革：重新划分摄政区行政区域，设立省级议会且议员主要由中央派遣，建立近代官僚机构，加强对地方官员监管。^④ 再次，组建小规模正规军，尝试实施义务兵役制。由于奥斯曼帝国无法向部落征兵，并且征兵的吸引力和强制力不足，利比亚常备军规模不足万人。^⑤ 最后，现代教育展现雏形，培育亲奥斯曼帝国的利比亚本土精英，客观上传播西方民族主义思想。19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摄政区引入现代教育体系，创办军校，兴办以土耳其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鼓励利比亚人就读军校。^⑥ 尽管奥斯曼帝国未能推广义务教育、建立高等教育，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是借助教育体系传播开来，成为利比亚民族主义重要的文化来源。

在奥斯曼帝国控制外的昔兰尼加，赛努西运动乘势崛起，高举反对西方殖民者的宗教民族主义旗帜。1843 年，赛努西教团得到 3 个昔兰尼加大型部落^⑦追随后发起赛努西运动，逐步建立起具有国家雏形的赛努西酋邦。赛努西运动号召建立统一乌玛，创建了遍布昔兰尼加的适合部落生活条件的扎维亚“城市”网络，^⑧

① 哈全安：《中东史（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42—443 页。

② Ali Abdullatif Ahmida,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ya: State Formation, Colonization and Resistance, 1830 - 1932*,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p. 68.

③ Ali Abdullatif Ahmida,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ya: State Formation, Colonization and Resistance, 1830 - 1932*, p. 59.

④ 韩志斌：《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利比亚史》，第 114—115 页。

⑤ Lisa Anderson,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 1830 - 1980*, pp. 72 - 73.

⑥ Amal Obeidi, *Political Culture in Libya*, Routledge, 2001, p. 34.

⑦ 这 3 支部落分别是萨阿迪部落联盟中的阿瓦吉尔（Awagir）部落，巴拉萨（Bara'sa）部落以及马哈巴（Magharba）部落，至今它们仍然是昔兰尼加重要的大型部落。Tarek Ladjal and Alexios Alecou, "Tribe and Stat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A Khaldunian Rea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bya in the Modern Era 1711 - 2011," *Cogent Arts & Humanities*, Vol. 3, No. 1, 2016, p. 7.

⑧ 扎维亚最先是赛努西运动的布道场所，后来发展成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宗教、经济、行政等多功能中心。E. E. Evans - Pritchard, *The Sanusi of Cyrenaica*, Clarendon Press, 1949, p. 76.

形成朴素的部落民主政治制度,^① 并与法国殖民者长期斗争,是成熟的地方抵抗力量。赛努西运动还与奥斯曼帝国达成合作,1856年奥斯曼帝国承认教团在昔兰尼加的统治地位,作为回报赛努西运动负责维护昔兰尼加和费赞地区的安全。^② 赛努西运动宗教民族主义的核心在于扎根昔兰尼加部落社会,在反对西方殖民者的圣战中熔铸共同体意识。

第二,意大利殖民统治中断了利比亚现代化进程,造成利比亚人民深重苦难,塑造了利比亚现代化反殖民主义的宗旨。1911年9月29日,意大利向奥斯曼帝国宣战。10月5日,意大利占领利比亚,内外交困的奥斯曼帝国签订了《洛桑条约》,割让利比亚。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利比亚反意抵抗组织被迫各自为战,在意大利人分而化之、重点打击的策略中败下阵来。1932年,意大利完全占领利比亚。意大利对利比亚种族主义的殖民政策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意大利法西斯将利比亚视为舒缓人口压力的农业殖民地,挤压利比亚人的生存空间。法西斯上台后,意大利殖民当局开始没收利比亚人的土地和财产,并将之分配给意大利农业移民。^③ 1932年,意大利政府以官方名义推动农业殖民化。1938年,意大利向利比亚输出移民,最多达两万人。^④ 到1940年,整个利比亚大约有11万意大利殖民者。其次,意大利政府排斥利比亚人参与政治。意大利殖民当局掌握绝对权力,除少数政府雇员外,利比亚人几乎没有参政权。^⑤ 最后,意大利政府奉行“文化灭绝”政策。1928年意大利颁布法令,禁止出版阿拉伯语出版物,停办阿语学校,强行要求利比亚人接受意大利语言和文化。^⑥ 换言之,意大利殖民统治只是完成了“破坏性”使命,其基于种族主义的“意大利化”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否定和摧毁了利比亚早期现代化的初步成果。

第三,利比亚人在反意抗争中铸就宗教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来自反意抗争中不同抵抗类型的实践和利比亚知识分子的思想倡导,也成为推动利比亚独立的内部动力。的黎波里塔尼亚民族主义者建立了阿拉伯世界

① Ali Abdullatif Ahmida,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ya: State Formation, Colonization and Resistance, 1830-1932*, pp. 98-99.

② Lisa Anderson,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 1830-1980*, p. 73.

③ E. E. Evans - Pritchard, *The Sanusi of Cyrenaica*, pp. 194-195.

④ John Wright, *Libya: A Modern History*, p. 21.

⑤ Lisa Anderson,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 1830-1980*, pp. 219-220.

⑥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Continuity and Change*, Routledge, 2015, p. 19.

首个共和国，即的黎波里共和国。^① 在昔兰尼加则是宗教圣战与反意抗争相结合。现代国家概念在利比亚反意抗争的实践中逐渐形成。

思想上，流亡在外的精英从事反意宣传和政治活动，受不同民族主义思想流派影响，回到利比亚后参与利比亚独立的政治议程。一方面是宗教与民族主义结合，主张“圣战”思想与反意抗争相结合，为谋求国家独立披上宗教合法性，政治上则谋求在赛努西教团领袖赛义德·伊德里斯（Sayyid Muhammad Idris al-Madhi al-Sanusi）的领导下建国。另一方面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巴希尔·萨达维（Bashir al-Sa‘dawi）^② 为代表，主张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共和国。巴希尔·萨达维领导的流亡团体致力于争取阿拉伯世界支持利比亚的反意抗争，思想上与泛阿拉伯主义契合。^③

第四，大国博弈与利比亚民族主义相互竞逐，利比亚在妥协中借助联合国实现独立。1943 年北非战役结束后，英国占领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法国占领费赞，利比亚的命运掌握在大国手中，大国博弈成为影响利比亚问题解决最主要的外部因素。1948 年 9 月 15 日，英、美、法、苏四大国互不妥协，利比亚问题陷入僵局，只能交由联合国大会处理。

在联合国大会上，英国力主托管利比亚。1949 年 4 月，英、意出台贝文—斯福札计划（Bevin-Sfoza Plan），即英、意、法分别托管利比亚三个地区，十年后再让利比亚独立。这一计划激起利比亚国内普遍反对，民族主义情绪前所未有的高涨，并得到苏联以及众多阿拉伯国家一致支持。最终，贝文—斯福札计划遭到联合国大会否决，大国也放弃了托管利比亚的设想。1949 年 11 月 21 日，经过激烈讨论，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利比亚独立决议，要求利比亚不迟于 1952 年 1 月 1 日独立。^④

然而，大国干涉从未远离利比亚。为了方便获取战略利益，英、美压缩了利比亚筹备国家独立的时间。^⑤ 结果是联合国大会给予利比亚的独立准备时间不足 3 年，大国殖民托管的阴影仍笼罩着利比亚政治精英，后者只能最大程度地妥

① Majid Khadduri,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John Hopkins Press, 1963, pp. 21-22.

② 巴希尔·萨达维被誉为“利比亚民族主义之父”，他最早在阿拉伯世界公开提出利比亚民族主义纲领，认为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组成新的乌玛即独立国家，也是他最早开启利比亚流亡精英的民族主义活动。Anna Baldinetti, *The Origins of the Libyan Nation: Colonial Legacy, Exil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Nation-State*, Routledge, 2010, pp. 81-82.

③ Anna Baldinetti, *The Origins of the Libyan Nation: Colonial Legacy, Exil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Nation-State*, pp. 102-105.

④ 韩志斌：《地缘政治、民族主义与利比亚国家构建》，《历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130—145 页。

⑤ FRUS, 1949, Western Europe, Vol. 4, pp. 572-574.

协,力求在时限内建构起国家雏形。在联合国专员帮助下,利比亚照搬西方政治制度。^① 由于缺失自主设计政治制度、整合国内政治资源的机遇,利比亚不得以妥协地建构起缺乏中央权威的新国家。1951年12月24日,国王伊德里斯宣布建立利比亚联合王国,利比亚现代化迈入新阶段。

总的来说,利比亚现代国家建构是内外动力在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19世纪以来,利比亚饱受殖民主义荼毒,奥斯曼帝国引入早期现代化的成果遭到意大利殖民者摧毁,民族主义成为利比亚前国家时期最重要的遗产。利比亚缺少国家建构的历史,又遭受大国干涉影响,由联合国“制造”而成的现代国家具有鲜明的“先天不足”。伊德里斯王朝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现代化主权,如何建构驱动现代化进程的领导核心决定着利比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抉择。

君主制民族主义：现代化道路之争与过渡性现代化实践

建立民族国家是现代化开端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原因在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要求政治共同体经过整合建立有效的中央权力,从而主动促进和领导多领域的现代化发展与改革,并有效控制现代化进程引发的混乱。受限于利比亚特殊的独立过程和资源禀赋,伊德里斯王朝的现代化实践具有典型的过渡性,即从联邦制过渡到集权制,从各省“单打独斗”到统一的现代化改革齐头并进,从亲西方道路转向阿拉伯社会主义。特别是伊德里斯王朝废联邦改集权后的现代化改革承接前后两个阶段,其措施、特点和影响却被国内外学界长期忽视。

立国之初,在国家构建模式上就存在联邦制和集权制两种主张,两者实际上是关于利比亚现代化的两条道路,区别在于现代化驱动核心的差异。^② 联邦制是妥协的现代化模式,源于国家极为贫困,不同地区间缺乏历史联系的条件约束。表现为:各省各为其政,国家经济发展依赖西方援助和资本,^③ 政权抑制民族主

① 当时利比亚的政治制度大致包含以下内容:实行君主立宪制;参照西方两院制,设有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的联邦议会,以及省级地方议会;伊斯兰法庭与世俗法庭并行,设有各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3个省份组成利比亚联合王国,实行联邦制,在各省高度自治的前提下向联邦政府让渡权力,宪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所属权力之外的权力归地方各省所有。Majid Khadduri, *Modern Libya: A Study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p. 185 – 205.

② 韩志斌:《利比亚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第98—108页。

③ IBR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Report of A Mission Organiz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Government of Libya*, John Hopkins Press, 1960, p. 38.

义政治力量,^① 地方依赖中央补贴财政赤字。集权制则是依托石油收入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改革,民族主义充当政治合法性和精神驱动力,以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简称“一五计划”)为中心。

利比亚联邦制有如下特点: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制衡、互相约束,地方政府的权力远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行政部门齐全而完善,行政人员的数量远超中央政府。利比亚之所以在立国之初采取联邦制主要有以下因素:一是联邦制是利比亚各省谋求快速建国的妥协结果;二是松散的联邦制成为西方国家影响利比亚的最佳方式;^② 三是利比亚碎片化的地缘结构决定了联邦制的治理模式。利比亚联邦制对缓和地方矛盾起着重要作用,是利比亚“先天不足”的民族国家构建的必然逻辑,尽管它与现代化的客观需求背道而驰。^③

1959 年,利比亚发现石油后,联邦制成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最主要的掣肘。首先,联邦制的利比亚基本上是一种松散的地方性关系,不具备推动利比亚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一方面,地方“藩镇割据、各自为政”的权力结构限制了中央推行现代化改革的空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间政策和制度不协调,阻碍国家提升经济治理能力。例如,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都有省级的所得税、工业登记和许可制度,限制两省之间货物流动,甚至一度外汇管制权都归属省级政府。^④ 联邦政府很难与省级政府就重大国事进行协商,遑论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其次,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冗员现象严重,形成浪费和低效率的官僚体制。1957—1958 年度,利比亚向政府工作人员支付的工资总额为 600 万—700 万利比亚磅,占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以上。^⑤ 最后,联邦政府职能限制了石油资源有效开发。发展石油工业要求利比亚政府拥有统一的税收、监管制度和明确的产权界定。^⑥ 特别是利比亚石油产地集中于苏尔特盆地,石油开采和运输均涉及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松散的联邦制无疑加剧石油开发的制度性成本。

① 1952 年 2 月 19 日,萨达维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进而引发其支持者与政府的冲突。2 月 21 日,萨达维被驱逐出境,利比亚随即宣布禁止政党活动,颁布新闻管制,此后利比亚政治活动和政治参与都被局限在很小范围内。[美] 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利比亚史》,韩志斌译,东方出版中心 2015 年版,第 97—98 页。

②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 47.

③ 韩志斌:《利比亚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第 98—108 页。

④ IBR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Report of A Mission Organiz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Government of Libya*, p. 76.

⑤ IBR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Report of A Mission Organiz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Government of Libya*, p. 75.

⑥ Saskia Van Genugten, *Libya in Western Foreign Policies, 1911 - 2011*,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16, p. 72.

1961年9月,利比亚首次商业出口原油,本国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政治制度也从联邦制转向中央集权制。1963年4月,利比亚修改宪法,正式废除联邦制改为集权制。其主要内容是:废除省级立法会和司法制度,国名也从利比亚联合王国改为利比亚王国;石油收入、公司及个人税收归属中央政府,利比亚政治结构逐渐从联邦制过渡到单一制,地方权力收归中央。^①改为集权制后,伊德里斯王朝制定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君主制民族主义政权得以真正开启现代化改革。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弥补农业发展历史欠债,采用综合性手段提高农业产量,推动农业现代化。联邦制时期,农业是利比亚最重要的产业,吸纳了全国最多的劳动力。然而,利比亚农业生产方法原始,农民生活没有保障,农业生产环境恶劣,土地部落所有制限制了农业投资动力。^②其结果是农业生产条件恶化拖累了伊德里斯王朝的财政。1955—1958年,利比亚联邦政府29%的公共支出用于农业补贴和避免水土流失,18%用于电力和水供应。^③“一五计划”期间,农业拨款2927.5万利比亚镑,占该计划总额的17.7%。^④利比亚农业现代化的具体措施包括:提供直接的农业补贴、无息贷款和农产品价格保护;促进农业生产模式初步革新,许多农场引进良种、新技术并配备新式柴油农业机械;推动部落定居计划。1963年7月,利比亚设立国家农业定居管理局(National Agricultural Settlement Authority),主要负责分配国有土地,帮助定居农民购置启动物资,但所建农场大多依赖国家补贴,成效参差不齐。^⑤该机构还为农民提供教育和培训,推广现代研究方法和适宜耕作方法的试验。从结果上看,自1963年以来利比亚农业生产一直保持4.5%左右的年增长,显示出改善迹象。^⑥不过,农业现代化虽然使农业产量连年增长,但是难以满足国内急剧增长的农产品需求,利比亚不可避免地由粮食出口国转变为粮食进口国。

第二,大规模新建公共基础设施,弥补基建缺失。伊德里斯王朝“一五计划”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共花费4490万利比亚镑,占总发展计划的26%,主要

①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 64.

② IBR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Report of A Mission Organiz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Government of Libya*, pp. 130 – 131.

③ IBR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Report of A Mission Organiz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Government of Libya*, p. 37.

④ FCO/39/85/,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Libyan Economy Since the Revolution, ANNEX A: Five Yea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 1963 – 1968,” *Adam Matthew Digital*, p. 1.

⑤ J. A. Allan (eds.),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15, p. 15.

⑥ J. A. Allan and K. S. McLachlan, *Libya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15, p. 17.

修建房屋、学校、医院、办公楼、公路、机场和港口等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基础设施。^① 1963—1968 年，利比亚电力供应的装机量增长了 3 倍，并重建了连接东西部的沿海公路，新机场建设亦被提上日程。^②

第三，工业领域优先发展石油工业和建筑业。联邦制时期，利比亚工业尚处于空白阶段，而突破重点领域是工业化起步的唯一路径。石油工业是利比亚经济现代化的引擎。1962—1969 年，利比亚政府的石油收入从 4 千万美元增长至 8 千万美元，其中 1966 年石油工业产值占当年利比亚国内生产总值的 60%。^③ 利比亚石油工业突飞猛进，一方面得益于利比亚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吸引大量中小外国石油公司参与开发利比亚的石油资源；另一方面则缘于利比亚原油富有市场竞争力，即油质低硫和不经苏伊士运河的便利交通。此外，“一五计划”重点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助推利比亚建筑业迅猛发展：1964—1966 年，利比亚水泥进口量增长了 3 倍，建筑业的经济贡献翻倍。^④ 然而，制造业增长却陷入瓶颈，食品加工工业占据制造业主流，重工业仍局限于石油行业。

第四，修建大量廉租房，建立社会保障系统雏形。“一五计划”期间，利比亚修建了 10 万套廉租房，^⑤ 初步建立了国家保险计划并使覆盖面扩大至 17 万人，^⑥ 社会保险系统显露雏形。不过，伊德里斯王朝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较为粗糙，短时间内修建大量廉租房却不遏制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在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利比亚城市房价飞涨反而使特权阶层借机一夜暴富，^⑦ 加剧利比亚社会贫富差距。

第五，伊德里斯王朝现代化最重要的遗产是早期石油国有化措施。这一时期利比亚石油产业最重要的特点是：独立的中小型石油公司占据半壁江山，在原油生产份额上与国际石油巨头基本并驾齐驱。^⑧ 利比亚政府得以分而化之，在收回石油主权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1968 年 4 月，利比亚仿照海湾国家成立国有利

①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Libyan Economy Since the Revolution,” *Adam Matthew Digital*, p. 2, p. 97.

②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Libyan Economy Since the Revolution,” p. 98, pp. 105 – 107.

③ Ragaei El Mallakh, “The Economics of Rapid Growth: Libya,”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23, No. 3, 1969, pp. 308 – 309.

④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Libyan Economy Since the Revolution,” p. 96; Ragaei El Mallakh, “The Economics of Rapid Growth: Libya,” p. 313.

⑤ [美] 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利比亚史》，第 113 页。

⑥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Libyan Economy Since the Revolution,” p. 28.

⑦ Dirk Vandewalle,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Oil and State Building*,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4.

⑧ [美] 约翰·库利：《利比亚沙暴——卡扎菲革命见闻录》，赵之援、汪淼、王正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2—64 页。

比亚石油总公司,规定外国石油公司必须与利比亚石油总公司合作,以成立附属子公司的形式参与利比亚石油生产。伊德里斯王朝借此迈出收回石油主权的坚实一步。换言之,早在卡扎菲上台前,利比亚就已制定措施逐步从国际石油公司手中夺回更多利润,奠定了利比亚收回石油主权的基础。

改为集权制后,伊德里斯王朝现代化实践有以下特点:一是难以摆脱西方国家影响,外国军事与经济存在仍然占据优势地位。经济上,外国人控制了黎波里塔尼亚大多数工厂,^①利比亚机场也几乎由外国航空公司运营。^②军事上,伊德里斯王朝依赖英、美军事保护,以援助换基地政策保留了两大西方军事基地,即美国惠勒斯基地和英国阿丹姆基地。二是地租型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发现石油后,伊德里斯王朝资本过剩,其现代化表现为大规模投资多个领域,国家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权钱交易极为猖獗,导致严重腐败。此外,劳动力短缺是国家发展掣肘,利比亚 1/3 以上的建筑工人是外籍劳工。^③三是属于混合过渡型,具备阿拉伯社会主义模式部分特征。民族主义和反帝反殖是阿拉伯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内容,该模式在实践中强调国有化、计划经济与阶级和谐,致力于推动社会公平正义。^④伊德里斯王朝改为集权制后,利比亚政府推行国家发展计划,重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试图使石油收入惠及广大民众,外交上则尝试摆脱西方国家影响。

伊德里斯王朝现代化存在结构性缺陷,核心原因在于利比亚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无法应对现代化转型带来的危机。第一,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引发社会剧变。利比亚通胀螺旋起因于外部资金涌入造成利比亚市场需求远超国内供给能力,高素质劳动力短缺迫使用工成本大幅提高,从而抬高国内商品和服务生产的价格。同时,“一五计划”的大规模投资助推通胀攀升。1965—1968 年,利比亚农产品批发价格普遍上涨 1/3。^⑤恶性通胀使大部分利比亚人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据统计,1964 年利比亚失业率高达 8.4%。^⑥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全球生活成本城市排名中,的黎波里高居第九。^⑦伊德里斯王朝现代化在石油收入推动下,使

① IBR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Report of A Mission Organiz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Government of Libya*, p. 179.

② IBR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ibya: Report of A Mission Organiz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Government of Libya*, p. 229.

③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Libyan Economy Since the Revolution,” p. 96.

④ 王铁铮、闫伟:《中东国家现代化实践及历史反思》,《历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50—51 页。

⑤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Libyan Economy Since the Revolution,” p. 10.

⑥ William C. Wedley,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in Libya,” *The Libyan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view*, 1966, p. 62.

⑦ Ragaei El Mallakh, “The Economics of Rapid Growth: Libya,” p. 315.

货币关系逐步取代利比亚原先半封闭的经济、社会结构，利比亚现代化模式急剧转型。然而，伊德里斯王朝未能控制现代化转型衍生的恶性通胀，社会阶层急剧分化，贫富差距极为悬殊，反而摧毁了自身统治基础。

第二，多领域的系统性腐败和僵化的君主统治阻碍了伊德里斯王朝突破现代化“深水区”。伊德里斯王朝以部落政治构建国家政治制度。^① 利比亚发现石油后，君主制政权依赖部落支持，创建了以进入国家分配机构为中心的食利团体，^② 特权网络层层衍生，出现了所谓的“庇护主义”结构，^③ 国家丧失监管与遏制腐败的能力。严重的腐败现象蔓延至利比亚政治、经济等领域，根本性地阻碍了伊德里斯王朝深化现代化改革。

第三，伊德里斯国王的外交战略与利比亚政府的外交政策互斥。相较于利比亚政府表现出的亲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因恐惧埃及“霸权”，伊德里斯国王继续奉行亲西方道路。^④ 美国事实上利用伊德里斯国王对埃及的敌视和恐惧，使利比亚成为美国对抗激进阿拉伯国家的堡垒。^⑤ 1967 年 6 月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面对国内汹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伊德里斯国王选择逆潮流地保持同美国的亲密关系。他甚至直接向时任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大卫·纽森（David D. Newsom）询问：“美国准备如何防御，以防利比亚受到攻击……纳赛尔在叙利亚和也门都失败了，但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对利比亚开战。”^⑥ 伊德里斯国王迫使利比亚政府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难以为继，其保留美国军事基地的政策更是逆民族主义潮流，政权合法性因而消耗殆尽。

总而言之，伊德里斯王朝现代化道路经历了从联邦制向集权制转换，统一了国家权威才得以开展综合性改革。伊德里斯王朝现代化改革旨在弥补缺点和突破重点，积累现代化基础性成果，但其过程却陷入“失范”状态，远远超出君主制现代化模式的控制范畴，伊德里斯王朝反而成为阻碍利比亚现代化的陈旧因素。利比亚呼唤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这就是利比亚阿拉伯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前提。

① 闫伟、韩志斌：《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西亚非洲》2013 年第 2 期，第 118—120 页。

② Dirk Vandewalle,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Oil and State Building*, pp. 52 – 53.

③ 李鹏涛、陈洋：《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特征与当代非洲国家治理》，《西亚非洲》2020 年第 3 期，第 40—41 页。

④ 伊德里斯国王亲西方立场最鲜明地体现在寻求美国直接的安全保护。1965 年 9 月 1 日，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向利比亚国王伊德里斯致信，保证美国不会对袭击利比亚的侵略行为漠不关心，事实上仅给予伊德里斯国王口头宽慰。FRUS, 1964 – 1968, Vol. 24, Africa, pp. 110 – 111.

⑤ FRUS, 1969 – 1976, Vol. 24, Middle East Region and Arabian Peninsula, 1969 – 1972; Jordan, September 1970, p. 14.

⑥ FRUS, 1964 – 1968, Vol. 24, Africa, pp. 139 – 140.

革命民族主义：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

二战后，大多数阿拉伯共和制国家都选择阿拉伯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发展道路。1969年9月1日，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通过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革命指导委员会（简称“革指会”）掌握政权，由此掀开革命民族主义^①的序幕，利比亚现代化迈入新阶段。卡扎菲统治时期，利比亚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因为民族主义是利比亚现代化的内部驱动力和合法性基础，同时民族主义进程与现代化目标基本一致，^②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相辅相成。

1969年政变是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及其现代化模式的起点，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革命军官们从特殊国情出发逐步探索出具有利比亚特色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模式。正如卡扎菲的副手贾鲁德所说：“选择社会主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它提供了解决我们人民问题的唯一手段。”^③另一方面在于政变后采取的一系列系统而影响深远的现代化变革。从现代化研究视角出发，革命民族主义通过革命手段进一步推动利比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并以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模式加之结构化。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有以下方面。

第一，政治现代化方面，卡扎菲革命民族主义构建了具有利比亚特色的政治体制。首先，否定西方政治制度，实行直接民主。革命民族主义构建新型政治制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动员利比亚民众，卡扎菲的回答是民众统治和直接民主。1971年1月，卡扎菲在扎维耶宣布利比亚实行民众统治。1973年4月，卡扎菲发动民众革命，以最广泛的方式动员全国民众参与国家制度建设。在《绿皮书》

① 革命民族主义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形成于独裁政权失去了控制现代化进程的能力而崩溃；二是强调以抗拒社会作为新政权的基础，形成了倾向于现代化并较有内聚力的精英团体，从而使现代化模式与结构定型化；三是现代化的群体具有强烈的内部取向，精英一旦占据优势，就会强制推行自己的制度模式与变迁取向。民族主义精英的革命目标在于构建一种具有弹性结构的权力中心，约束与容纳各阶层的意志与利益。[以]埃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145页。

② 田文林：《中东民族主义与中东国家现代化》，《世界民族》2001年第4期，第20—21页。

③ 卡扎菲的表述是：利比亚社会主义起源于阿拉伯—伊斯兰（传统），并致力于平等、合作和消除剥削；利比亚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消灭私有财产，也不能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此外，利比亚社会主义包括终结庇护制度和奴隶制，终结男女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歧视，以及把利比亚的阿拉伯人从贫困和落后中解放出来。“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Libyan Economy Since the Revolution, The Libyan Economy Since The Revolution,” 14 April 1971, Adam Matthew Digital, pp. 4–5.

中，卡扎菲认为西方政党和代议制是剥削的象征，只有直接民主才能解决利比亚的政治问题。^① 1977 年 3 月 2 日，卡扎菲颁布《人民权力宣言》，正式宣布建立利比亚直接民主制度，其主要内容是民众任命基层人民委员会，各基层人民大会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构总人民大会，各级人民大会建立相应的人民委员会作为执行机关。自此，利比亚国家制度的构架建立起来。

其次，革命领导层内乱使卡扎菲转向克里斯玛型统治。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夺取政权是利比亚现代化过程中新旧权力中心交替的逻辑结果，然而革指会不是具备高度内聚力的政治组织，革指会成员关于利比亚未来道路存在争议。^② 1975 年 8 月，革指会内部斗争达到高潮，两名革指会成员发动未遂政变，卡扎菲顺势开展政治清洗，革指会被缩减至 5 人。自此，卡扎菲坚持通过各种独特方式增强个人统治的魅力，将自身塑造为反抗西方国家的先锋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展现魅力型统治的特征。^③

再次，部落力量填补高层政治真空。鉴于伊德里斯王朝的部落政治特征，革指会掌权后清洗了国家机构中与旧政权联系紧密的部落精英。1975 年，革指会内乱正式终结了革命民族主义的集体领导，政权出现高层政治真空。卡扎菲转而任命其部落成员担任重要职位，以此巩固个人权力。卡扎菲所在部落的成员开始进入军队与国家安全等重要领域。^④ 某种程度上，卡扎菲转向寻求部落力量支持也反映出卡扎菲不排斥部落认同的执政思想。正如丽萨·安德森（Lisa Anderson）指出：卡扎菲将国家构建成为一个大部落、大家庭。^⑤

最后，民众权威与革命权威分离，借助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体系进行国家治理。1978 年 9 月 1 日，卡扎菲宣布革命权威与民众权威分离。1979 年 3 月，卡扎菲正式宣告建立以革命委员会为代表的革命权威机构，利比亚因此出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分享国家权力的政治结构。在二元政治结构中，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正式制度行使行政权，负责绝大部分的国家日常工作。革命委员会则是非正式制度的代表，其成员主要来自基层人民委员会内效忠卡扎菲的年轻一

① [利] 穆阿迈尔·卡扎菲：《绿皮书》，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20 页；第 37—40 页。

②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p. 100 – 101.

③ Omar I. El Fathaly and Monte Palm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Libya*, Lexington Books, 1980, pp. 64 – 65.

④ Dirk Vandewalle,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Oil and State Building*, p. 88.

⑤ [美] 菲利普·库里、[以] 约瑟夫·克丝缇娜主编：《中东部落与国家形成》，韩志斌等译，商务印书馆 2022 年版，第 332 页。

代,^① 职能是“保卫革命”,实质是与正式国家机构争夺权力,^② 充当卡扎菲监督民众和巩固统治的工具。卡扎菲个人则凌驾于两种政治制度之上,实际掌握国家大权。二元政治结构是卡扎菲治下利比亚最重要的政治制度特征,也是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异化为卡扎菲权威统治的重要标志。

第二,经济现代化方面,利比亚收回石油主权,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实行国民经济全面国有化。首先,利比亚实现石油国有化,奠定革命民族主义的物质基础。利比亚主要采取三步走战略收回石油主权:一是逐步抬高原油价格。1970年,利比亚政府步步为营成功迫使各大石油公司同意抬高油价,以换取提升原油产量。^③ 二是改组国有石油公司,逐步接管石油工业。1970年5月,利比亚政府将伊德里斯王朝遗留的石油总公司改组为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借助下属子公司逐步接管和控制石油生产和销售环节。三是1973年9月1日利比亚正式全面国有化境内外国石油公司。经过三年斗争,利比亚石油收入由1970年的13亿美元增至1973年的23亿美元,赎罪日战争后利比亚石油收入进一步暴涨,1976年利比亚石油生产的65%已由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控制。^④

其次,重点实现工业化,但农业现代化陷入瓶颈。工业方面,利比亚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重工业。第一个经济和社会转型计划(1976—1980年)是卡扎菲时期利比亚工业发展的分水岭,工业发展计划占比19%,利比亚开始注重发展重工业。^⑤ 第二个转型计划(1981—1985年)期间利比亚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发展,具体表现为:轻工业领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重工业发展中心转向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碳氢工业、冶金业、建筑业和食品加工业是主要领域。^⑥ 然而,受限于人才储备不足和技术水平落后,碳氢工业不足以建立完整的产业链。

农业方面,卡扎菲推行所谓的“绿色革命”,强调通过农业现代化实现自给自足,主要措施有:规划五大农业区,引入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在国家发展计划中大规模补贴农业,改善农民生活,修建农业基础设施等。1977年,卡扎菲开启土地国有化进程,利比亚几乎所有土地全部国有化。^⑦ 但是土地国有化仅局

① Dirk Vandewalle (eds.), *Libya Since 1969: Qadhafi's Revolution Revisited*, p. 67.

② Dirk Vandewalle (eds.), *Libya Since 1969: Qadhafi's Revolution Revisited*, p. 109.

③ [美] 约翰·库利:《利比亚沙暴——卡扎菲革命见闻录》,第89—91页。

④ [美] 约翰·库利:《利比亚沙暴——卡扎菲革命见闻录》,第102、108页。

⑤ J. A. Allan (eds.),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 58.

⑥ J. A. Allan (eds.),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p. 59—67.

⑦ Dirk Vandewalle,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Oil and State Building*, p. 108.

限于土地产权变化，土地分配改革成效有限，参与分配的土地均是未开垦的荒地。卡扎菲试图重新分配所有超过 10 公顷的土地，以消灭农业雇佣现象，但遭到土地所有者广泛抵制，以至于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只有部分地区实施了土地再分配。^① 革命民族主义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在于把粮食安全等同于自给自足，片面强调农业产量增长。此外，利比亚大规模农业生产还以牺牲水资源为代价，农业密集区地下水位显著降低。^②

再次，从利比亚化到激进国有化，利比亚所有制经历剧烈变迁。20 世纪 70 年代初，卡扎菲实行所有制的利比亚化政策，旨在消灭除石油公司外旧政权遗留的外国经济存在。主要内容有：驱逐所有意大利社区，没收其土地和财产；要求政府合同分配给利比亚公司，新的小型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卡扎菲实行利比亚化的目标是经济奖励参与革命的利比亚民众，从而巩固革命民族主义合法性。^③ 然而利比亚化政策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分裂的小型经济单位，不利于利比亚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卡扎菲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成熟，利比亚开始以《绿皮书》为蓝本推行激进的全面国有化。1977 年，卡扎菲颁布法令，规定除有成年男性后代的家庭外，任何利比亚家庭都不允许拥有一套以上房产，租客因而获得房东的房屋所有权。^④ 1978 年 9 月 1 日，卡扎菲宣布取缔私有经济，实行全面国有化，^⑤ 即使小型的零售部门也被国有超市取代。1981 年，利比亚已成为典型的国有经济体制。

最后，推动经济多元发展，致力于打破国民经济结构单一局面。利比亚政府主要通过制定发展计划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现代化。其总体特征是：致力于改变石油主导经济的格局，积极发展新兴工业；增加天然气产量，重视天然气勘探与开发；推进冶金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非碳氢工业加速发展；重视农业现代化，以自给自足为理想目标。革命民族主义经济多元化的局限性在于发展项目吸纳资金的效率不高，偏好资本密集和能源密集的先进技术，忽视相对易于发展的适用技术，^⑥ 为了现代化绩效而现代化的现象十分突出。

① Lillian Craig Harris, *Libya: Qadhafi's 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 State*, Routledge, 2022, p. 113.

② J. A. Allan and K. S. McLachl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Libya after Oil," *African Affairs*, Vol. 75, No. 300, 1976, p. 334.

③ Omar I. El Fathaly and Monte Palm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Libya*, p. 68.

④ Lillian Craig Harris, *Libya: Qadhafi's 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 State*, p. 113.

⑤ 卡扎菲推广国有化的口号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工薪阶层”，国有化首先从无产者接管工厂和企业开始。John Wight, *Libya: A Modern History*, pp. 264 - 265.

⑥ 黄民兴：《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第 28 页。

第三, 社会现代化方面, 利比亚传统部落社会分化为多元结构, 呈现城乡二元化发展现象, 地区发展不平衡。首先, 卡扎菲试图通过行政手段, 自上而下地改变利比亚部落社会特征, 但是未能达成目标。革命前利比亚是典型的部落社会, 游牧、半游牧人口占绝对多数,^① 部落事务高度自治。卡扎菲掌权后, 为破除部落影响采取了综合性措施: 清除旧政权的部落高官, 重新划分行政区和部落边界, 把不同部落划分至国家行政单位, 鼓励部落成员加入国家机构, 任命地方官员管理部落事务。^② 然而, 这些治理措施的成效很有限。政府任命的地方行政人员很难获得部落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地方行政结构改组取得成功, 却招致部落谢赫及其支持者反感, 后者厌恶被政府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③

其次, 卡扎菲发动民众革命和国民经济全面国有化, 推动部落社会分化。一种是坚持传统生活方式, 留在广大腹地的部落。这些部落依照亲属关系和传统行为模式自我管理部落事务, 认为现在生活是过去“人民政府”旧时光的遗留, 卡扎菲推动的直接民主和民众革命为部落传统与现代国家提供契合点。^④ 其表现为生活上享受政府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便利, 政治上不满卡扎菲朝令夕改, 对民众革命许诺的未来冷眼旁观。二是前往城市转型为“城市部落”。利比亚城市化是现代化带来的突出现象, 卡扎菲时期利比亚城市化快速推进。^⑤ 利比亚“城市部落”的形成原因是部落以集体为单位迁入城市, 借助福利政策购买地区性住房, 进而在城市内划分部落边界。例如, 某个部落购买整个街区, 这片地域便成为部落领地, 组成部落的家庭单位、地缘联系和亲属关系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城市部落”实质上构成了利比亚不可忽视的基层组织, 使城市呈现出“熟人社会”的特征。三是部分城市部落经济条件恶劣, 只能依赖政府福利艰难度日, 沦为城市边缘群体。部落社会分化也反映在人口分布层面, 呈现出城市大聚居, 广大腹地零星散居的特征。

① United Nations Technical Assistance Administration, *A General Economic Appraisal of Libya*, ST/T AA/K/Libya/1, 1952, p. 6.

② Omar I. Fathaly and Fathi S. Abusedra, “The Impact of Socio – political Chang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ibya,”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6, No. 3, 1980, pp. 231 – 232.

③ Omar I. El Fathaly and Monte Palmer, “Opposition to Change in Rural Liby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1, No. 2, 1980, pp. 259 – 260.

④ John Davis, *Libyan Politics: Tribe and Revolution, An Account of the Zuwaya and Their Government*, I. B. Tauris & Co Ltd, 1987, pp. 41 – 43, p. 182.

⑤ Waniss A. Otman and Erling Karlberg, *The Libyan Economy: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positioning*, Springer – 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07, p. 89.

最后,利比亚呈现城乡二元化发展特征,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利比亚经济现代化的工业项目基本建在地中海沿岸,^①这是降低人力和运输成本,发挥靠近欧洲市场的交通优势,以及城市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纯经济效益考量。这也反映了石油财富主要流向利比亚大城市的趋势,国家主要政治和经济活动集中于沿海城市,广大腹地的现代化则较为缓慢。此外,卡扎菲片面重视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昔兰尼加地区的发展需求遭到忽视。其主要原因在于卡扎菲对昔兰尼加与旧政权关系心存芥蒂,昔兰尼加精英遭受物质与观念双重歧视。卡扎菲时期,昔兰尼加地区成为多个重要反对派的发源地。

革命民族主义改变了部落社会的生活方式,利比亚社会结构出现深层次分化。然而,利比亚部落社会的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主要原因在于卡扎菲缺乏连续性的部落社会改造计划,其不稳定的革命政策引起民众不满。正如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所说:“许多利比亚人的‘部落主义’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生存方式,不是无法适应或改变的状态,而是一种对政府及其工作的自觉质疑。”^②卡扎菲依赖部落维护统治,直接民主制度,未经历大工业化生产以及部落传统的现代化转型是利比亚部落社会分化但仍保持基本特征的奥秘。

第四,思想文化方面,卡扎菲试图以革命民族主义构建新型政治共同体认同。卡扎菲革命前,君主制政权缺乏政治认同构建,^③部落认同根深蒂固,成为卡扎菲推动革命民族主义现代化的思想障碍。卡扎菲采取的解决方法是:利用革命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动员广大利比亚民众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统合民族主义与部落认同。然而,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末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退潮以及部落社会转型,部落认同并未被革命民族主义所取代,反而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第五,外交方面,卡扎菲革命民族主义诉诸泛阿拉伯主义,奉行反美、反以外交战略。自夺取政权以来,卡扎菲在外交上就以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激进的泛阿拉伯主义政策“闻名于世”。20 世纪 70 年代,卡扎菲数次推动利比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联合,结果均宣告失败,^④甚至因此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产生冲突。此外,卡扎菲坚定支持巴勒斯坦抗争,反对以色列,因而与美国关系急剧恶化并转

① J. A. Allan (eds.),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 63.

② John Davis, *Libyan Politics: Tribe and Revolution, An Account of the Zuwaya and Their Government*, p. 182.

③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p. 71 – 72.

④ Dirk Vandewalle (eds.), *Libya Since 1969: Qadhafi's Revolution Revisited*, p. 44.

向亲苏联政策。在革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架构内，利比亚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抗是利比亚与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延续。然而，随着 1978 年埃及与以色列和解，泛阿拉伯主义迅速衰落，卡扎菲奉行的激进政策及其支持恐怖主义的行径反而使利比亚在国际上愈发孤立。1986 年 4 月，美国轰炸利比亚引发政权短暂危机，^① 利比亚军事干预乌干达和乍得失败，洛克比空难后联合国于 1992 年和 1993 年陆续出台了制裁措施，^② 深受打击的利比亚经济陷入“萧条的十年”。

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型现代化的特征有：政治上表现为民众革命、二元政治结构以及卡扎菲个人威权统治的建构；经济上实行利比亚化和国有化，重点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致力于多元化的经济改革，形成分配型的国民经济模式；理论上体现在创立“世界第三理论”，出版指导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绿皮书》；外交政策上突出领导人的魅力，充当反美、反以先锋，不惜支持恐怖主义，最终招致国际制裁。

总而言之，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与伊斯兰社会主义相辅相成，构建了利比亚特色的激进现代化模式。在革命民族主义激情推动下，利比亚政府既负责现代化的制度安排、理论阐述，也通过权力杠杆推进利比亚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族主义政治权力的泛化。革命民族主义推动了部落社会分化，但那些势力强大的部落为了维护利益进行自我转向，并抵制国家深化现代化改革。此外，以革命委员会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崛起，逐渐从革命先锋转变为卡扎菲维护政权安全的工具，革命委员会边缘化后，由部落力量填补政治空缺。革命民族主义试图以“全能型国家”模式调控现代化，却因国家机构的臃肿和低效率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革命民族主义对利比亚的现代化改造很难达到既定目标，同时还引发一系列负面效应。革命民族主义力图把合法性建立在现代化政绩基础之上，但是一系列发展陷阱使之陷入难以摆脱的政绩困局。因此，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卡扎菲逐步放弃革命民族主义，谋求现代化转型。

超越民族主义：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转型与失败

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有其历史使命。^③ 一是实现民族和国家真正独立，动员民众并整合国内资源推动现代化，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利比亚革命民族

① 韩志斌等：《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7—206 页。

②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From Colony to Independence*, p. 205.

③ 田文林：《中东民族主义与中东国家现代化》，第 23 页。

主义基本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陷入“政治式现代化”的窠臼,难以按照现代化发展规律实现第二个目标。革命民族主义毕竟不是利比亚社会、经济和政治内在累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诸多方面背离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迫切需要与时俱进,通过自我革新实现现代化转型。

利比亚谋求现代化转型是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上,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中东国家驱动经济发展的推力普遍减弱,^①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引发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剧烈变革,阿以和谈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标志着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动荡。

卡扎菲废除革命委员会权力并缓和和安全部门的负面影响,^②革命民族主义形成的卡扎菲威权主义迟滞了政治民主化进程。经济上,利比亚急需解除国际制裁,革命民族主义将经济现代化置于政治需要的前提下,导致利比亚经济和社会发展难以按照自身规律前进的困境。意识形态上,革命民族主义失去赶走西方势力并开启利比亚自主现代化的魅力,由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革命力量转变为偏狭、落伍的保守政治力量。总之,这一时期利比亚国内矛盾迸发,旧的现代化道路难以适应国家发展新需求,利比亚现代化转型是大势所趋。

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转型的主要实践是政治自由化、经济市场化和外交务实化。首先,政治自由化主要表现为卡扎菲大规模与反对派和解,放松政治高压。1988 年 3 月,卡扎菲释放大量政治犯,同年 6 月总人民大会通过《绿色人权大宪章》,以法律条文的方式保障利比亚人民拥有一定的政治自由,宣告卡扎菲政治自由化改革开端。然而,政治自由化的范围始终局限于缓和政治高压政策内,未能搭建一个包容民众批评意见的公共政治平台。更重要的是,卡扎菲转向依赖部落支持政权,并将之公开化和制度化。1994 年 7 月,卡扎菲宣布成立由部落谢赫和长老组成的人民社会领导委员会(People's Social Leadership Committee),并在全国推广。^③人民社会领导委员会很快成为卡扎菲获取部落支持、讨论国家大事的核心政治组织,兼具分配石油财富、传达卡扎菲意志等职能。

其次,经济市场化改革强调从国有化逐步转变为私有化,建立市场导向型经济体系。1987 年 3 月,卡扎菲宣布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称之为“革命中的

① Ahmed Galal and Hoda Selim, "The Elusive Ques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rab Countries," *Middle East Development Journal*, Vol. 5, No. 1, 2013, p. 3.

② Dirk Vandewalle,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Oil and State Building*, pp. 146 - 147.

③ Ronald Bruce St John, *Libya Continuity and Change*, pp. 71 - 72.

革命”。^① 其主要措施是在农业和工业部门进行私有化改革，放弃进口替代政策，采用现代化管理方式，改革目标是建立市场导向模式。1988年9月，卡扎菲取消零售禁令，城市地区的市场和集市重新开放，石油和重工业领域仍以国有企业为主。1993年，利比亚开始吸引外资，开放利比亚货币兑换。随着国际社会放松制裁，利比亚加快了私有化进程。2003年，利比亚宣布彻底改革国有经济，允许外资进入利比亚石化、钢铁等多个重要领域。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宣布全面推进经济改革：对内建立证券交易所开设股票市场，进一步发展货币市场，减少政府开支，推广科学化管理；对外申请加入世贸组织，改善利比亚基础设施，增强外资吸引力。2005年1月，卡扎菲的儿子赛伊夫·伊斯兰·卡扎菲在达沃斯会议上宣布“旧的时代已经过去，利比亚将迈向现代化新阶段”^②。然而，利比亚市场化改革缺乏制度保障，人才储备和技术水平落后，国内私人企业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利比亚发展市场经济的进展缓慢而断断续续……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尚未明确摆脱过去的缺点。”^③

最后，利比亚外交转向与美国和解，奉行务实的外交政策。1999年4月，利比亚向国际社会移交两名洛克比空难嫌疑人，联合国因此停止制裁。此后，卡扎菲外交活动旨在结束利比亚遭受国际孤立的局面。到21世纪初，利比亚已成功地与许多国家重建了经济和外交关系。利比亚争取回归国际社会最核心部分是改善与美国关系。9·11事件后利比亚宣布反对恐怖主义，2003年利比亚更是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俨然成为西方国家眼中的“模范生”。2004年6月，美国正式恢复与利比亚中断24年的外交关系，这既显示了利比亚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也构建了利比亚式现代化转型与改革的大背景。

利比亚现代化转型并非一帆风顺。转型期间，原有国有经济制度与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体系产生特殊矛盾，这些矛盾大都具有悖论性质。利比亚式现代化道路至少在以下层面存在潜在挑战和悖论。

第一，利比亚市场化改革依靠国家来推动，但市场强调经济独立与选择自由，而国家强调政治干预和管制秩序，这本身就是一种逻辑悖论。此外，利比亚现代化转型并未触及卡扎菲政权政治体制改革，卡扎菲家族在利比亚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利比亚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与封闭的集权政治体系之间的矛盾难以消除。

① Ronald Bruce St John, "The Changing Libyan Econom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2, No. 1, 2008, pp. 78 - 80.

② Dirk Vandewalle, *A History of Modern Libya*, p. 189.

③ IMF, "Country Report No. 06/136," April 2006, p. 22.

第二，由国家主导的市场化经济虽然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但也同时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市场化由国家主导，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便会被理解为政府无能和腐败，更容易激发民众的反政府情绪。

第三，利比亚改革派能力不足，反而充当国家治理“替罪羊”的角色。卡扎菲启动现代化转型后，改革派逐渐成为利比亚现代化掌舵人。为了加速和驱动私有化项目，利比亚经济和贸易部长苏卡利·穆罕默德·加尼姆（Shukri Muhammad Ghanem）于 2003 年 6 月升任总理。他认为，“利比亚的经济模式已经改变——这也是我能在这里任职的原因。我们正努力使私营部门参与经济。”^①然而，在利比亚二元政治结构内，改革派政府能进行多大程度的现代化改革存在严重疑问。其逻辑在于，卡扎菲掌握国家大权却始终拒绝为国民经济治理负责，他认为仅掌握行政权的民众政府应完全负责解决利比亚经济困难。卡扎菲曾说：“自 1990 年以来，像的黎波里这样一个拥有 150 万或 200 万居民的城镇一直缺乏饮用水。我告诉你：我没有这样的信息，我不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不负责设施建设；我也不是总理，也不关心这一点。”^②因此，卡扎菲推动的利比亚现代化转型很难达到既定目标，同时引发一系列负面效应。

整体上看，利比亚超越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转型具备一定成效。从积极一面看，在 2011 年卡扎菲政权倒台前，利比亚是非洲最富裕国家之一。利比亚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识字率、城镇医疗水平等各种指标中名列非洲前茅，^③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生。从消极视角出发，利比亚超越民族主义的现代化转型并未超脱卡扎菲威权政治的束缚，部落政治以制度化和常态化姿态回归。所谓的“经济市场化”改革沦为改良主义，国民就业高度依赖政府活动，城镇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腐败现象十分猖獗，经济结构畸形，碳氢工业创造了绝大多数的政府收入和生产总值。在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2011 年卡扎菲政权垮台，国家重建遥遥无期，利比亚现代化陷入停滞。总而言之，利比亚超越民族主义的现代化又部分回到以西方为目标的现代化道路上，折射出中东国家现代化面临的道路选择困境，难以平衡维护政治统治和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困境，以及缺少实现现代化的外部稳定环境。

① Neil Ford, “Libya Edges Back into the Fold,” *The Middle East*, October 2003, p. 49.

② Dirk Vandewalle, *Libya Since Independence: Oil and State Building*, p. 100.

③ Jean - Louis Romanet Perroux, “The Deep Roots of Libya’s Security Fragmentati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019, Vol. 55, No. 2, p. 208.

结 语

总的来看，利比亚式现代化的经济实践塑造了典型的地租型经济体，政治实践并未超越传统威权主义的范畴，民族主义则作为思想认同来源和合法性基础支撑现代化内核。民族主义、地租型经济形态和威权主义三位一体构成利比亚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模式。从利比亚革命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演变可以看出，利比亚式现代化变迁经历了一个曲折迂回的历史进程：经济上从依赖外部资金生存到全面利比亚化，从国有化再到私有化；政治上从民众主义到威权主义，从抵制部落政治再到部落政治回归；外交上从反西方到与欧美亲善；治国理念上从激进主义、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国家认同上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部落认同。

利比亚式现代化的变迁轨迹也反映了利比亚政治精英的治国理念经历了妥协主义、激进主义、理想主义到务实主义的转变。作为革命民族主义的倡导者，雄心勃勃的卡扎菲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既没有促成阿拉伯民族大一统，也未将利比亚改造成伊斯兰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略显残酷的现实是利比亚治国方略转变的直接动力。这种演变也说明国际社会变迁和中东“强人政治”危机，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是“魅力平凡化”过程。在中东政治生态中，“强人政治”现象十分普遍。但是，随着社会变迁和全球化冲击，仅凭铁腕和魅力来赢得民众认同、寻求制度合法性乃至推进政治变革已日益艰难。

总而言之，利比亚式现代化是政治发展先行却又滞后于经济、社会变迁的现代化。利比亚式现代化更是民族主义驱动的，使利比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创造了丰富物质与精神财富的现代化。目前，利比亚国家构建缺失，新的现代化道路尚未显现，利比亚仍处于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过渡的阶段。利比亚式现代化的成就与挫折表明，利比亚需要借鉴世界现代化的丰富经验，再次探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现代化道路，警惕西方国家干预和西方模式制造的现代化迷思。

（责任编辑：贺杨）

member of the G20, India's Africa strategy has once again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internationally. Existing studies have clearly shown that India's strategy for Africa is distinctive, boasting about its so called "the third way". Objectively speaking, India's Africa strategy includes telling India's stories well, strengthening high – level political exchanges,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partnerships, providing humanitarian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promoting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and building a multilateral interactive network. The attribute of "the third way" of India's Africa strategy is not only a practical choice, but also a result of active construction. Its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partnering, being good at speaking say, "doing small things", fighting big, framing, uniting, ranking and so on.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India's African strategy's "the third way" includes five levels: people, national, bilateral, regional, and global. With the continuous enhancement of India'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the impact of India – Africa cooperation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is inevitable. Dialectically speaking, people, countries, bilateral relations, regions, and the world are the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nalyzing India's strategy towards Africa, which also inspires China to make timely and effective responses at these levels. At the level of "people",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understanding with elites and ordinary people of African countri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adjust the models of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based on strategic goals and interests; At the bilateral level, guided by the needs of Africa, explore more sustainable cooperation paths with Africa; At the regional level,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partnerships with reg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African Union; At the global level, unite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ces, eliminate cooperation obstacles and their impacts to safeguard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Keywords: India, Africa strategy, India – Africa relations, the third way, discourse trap

Author: Yang Siling,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South Asia,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Kunming 650034).

From Monarchy Nationalism to Islamic Socialism **—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ibyan Modernization**

Xie Yuke and Han Zhibin

Abstract: Nationalism runs through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Libyan modernization.

Libyan modernization has gone through the following stages: from the early modernization achievements promoted by the Ottoman Empire but destroyed by the Italian colonialists, to the formation of religious nationalism and Arab nationalism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ibyan nation – stat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nsitional modernization after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modernization paths of the monarchy to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Libyan modernization by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from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to the transformation beyond nationalism, until the collapse of the Qaddafi regime in the upheaval of Middle East. The trinity of nationalism, rent – based economy and authoritarianism constitutes the historical form of Libyan modernization. Libyan moderniz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nationalism driving, with political development once preceding but finally lagging behind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Keywords: Libyan modernization, monarchy nationalism,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Islamic socialism

Author: Xie Yuke, PhD Candidate at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Han Zhibin,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External Intervention in the Libyan War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Saudi Arabia and Qatar

Wu Yan and Ding Shenghan

Abstract: The war in Libya wa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Arab Spring”, triggering external intervention by Saudi Arabia and Qatar. The change in foreign policy was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for Saudi Arabia and Qatar to intervene in the Libyan war. The strategic needs for expansion into Africa and Libya's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were the external factors that prompted the two countries to intervene in the Libyan war. During the war, Saudi Arabia and Qatar provided varying degrees of military, financial and public opinion support to relevant Libyan interests. In the Libyan war, Saudi Arabia and Qatar showed similarities in the trajectory of their interventions, political objectives, and economic control, but differed in their policy styles and attitudes towards religious politics. The intervention o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in the Libyan war not only prolonged and complicated the post – war chaos in Libya, but the evolution of